

第一辑

方國瑜文集

方國瑜 著
林超民 编



云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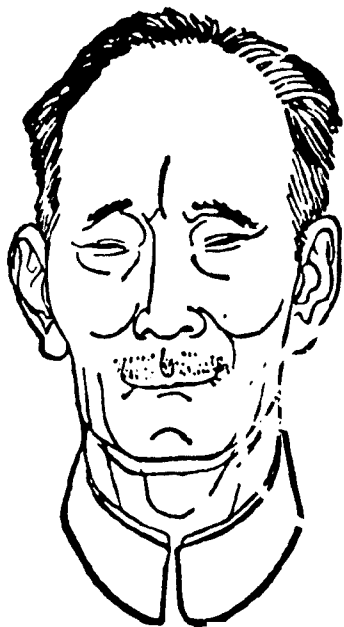
方國瑜文集

方国瑜 著

林超民 编

云南教育出版社

第一辑



责任编辑：黄显松

封面设计：陈俊

责任技编：汤家力

荣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国瑜文集. 第1辑/方国瑜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7

I. 方... II. 方... III. ①方国瑜-文集②地方史-研究-云南省-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0529 号

书 名：方国瑜文集（第一辑）
作 者：方国瑜
出 版：云南教育出版社（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印 装：云南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18.25
字 数：400 000
版 次：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3000
书 号：ISBN 7 - 5415 - 1940 - 5/C·11
定 价：46.00 元

编辑说明

方国瑜先生是名扬四海的教育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毕生潜心学术研究和教学，是西南民族史的开拓者、云南地方史的奠基人，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其已出版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彝族史稿》、《纳西象形文字谱》、《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等专著倍受学术界推崇，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民族史、中国历史地理、云南地方史的经典著作。除已出版的著作外，方国瑜还有大量的论著未能结集出版，有的手稿尚未刊布。为继承这份极为珍贵的遗产，我们编辑出版《方国瑜文集》。这对于继承方国瑜先生广博精深的学术成果、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细针密缕的考证风格、认真扎实的治学方法，推进历史学、民族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方国瑜文集》共五辑。第一辑收集方先生晚年所写的几篇理论文章和先秦至晋代的有关论著。第二辑收集方先生有关唐、宋时期的论著。第三辑收集有关元、明、清时期的著作。第四辑收集方先生金石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五辑所收为方先生三十岁以前语言学和音韵学方面的论著。

方先生在北京大学做研究生时的毕业论文《广韵声汇》三十八卷，因是音韵学的著作，难于排印，留待以后筹集经费影印出版。

方先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写成的《云南民族史讲义》三册，因分量较大，俟日后作为专书出版。

文集所编文章基本按报刊上发表原样或方先生手稿、誉清稿排印，只对个别明显的笔误作了订正。方先生的手稿、誉清稿多未句读，为方便读者，由编者加了标点。

在方先生文中，对一些典籍使用了简称，如《续汉书·郡国志》简称《续汉志》，《华阳国志·南中志》简称《南中志》，樊绰《云南志》简称“樊志”，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简称景泰《云南志》等。按出版规范，一般都改用全名。

学识渊博的方国瑜先生的论著以旁征博引、严密考证见长，每篇著作都引用了不少史料。编辑时按现代出版规范对文中的引文逐条查对。因时间和条件所限，有的书无法寻觅，少数引文无法核对。另外，少数引文与我们所能见到的史籍中的相关文句略有出入，因无法判断方先生引文出自何种版本，又无法获睹该书所有版本，故只好保留方先生引文原样，留待读者辨析、考究。

林超民

2001年6月

自序

——略述治学经历

国瑜生于边僻之乡，儿时因疾病折磨，资质粗笨异常，习惯于孤独生活。年九岁始发蒙，因不懂汉语，只用本民族（纳西）语言讲解汉字，颇感困难。读书小学、中学时，常促居小屋，终日伏案呬唔。稍长，自署书室曰“困而好学斋”以自勉。假日，从和让（德谦）先生习诗词者六年，未尝有佳作。将远游，先生临别赠言，诵《王渔洋诗话》“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之句，谓：瑜生性质朴，缺乏“才”、“趣”，而肯勉力，“学”、“理”可就；一生功力，能为学人，不宜为文人。此深知之言，铭记在心，拳拳弗失矣。

公元一九二三年至北京升学，多闻议论，胸襟开扩。次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因一场大病，休学二年，复学读本科。时“整理国故”之风甚炽，乃习考据学。先后从钱玄同（疑古）、余嘉锡（季豫）、马衡（叔平）诸先生，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且得高步瀛（阆仙）、吴承仕（检斋）、黎锦熙（劭西）诸先生启发教育，稍知读书门径。每有论述，发表于期刊，亦有存稿（有可取者，已编定《广韵声汇》一书及《困学斋杂著五种》）。又先后从陈垣（援庵）、梁启超（任公）、杨树达（遇夫）诸先生治史地之学，钩稽故实，发微阐幽，且多读西域、南海译著，增益新知，亦有

述作。至一九三三年，已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所长刘复（半农）先生催促瑜回乡习纳西族象形文字。秋间过昆明，获晤袁嘉谷（树五）先生，询所学，蒙赞许，纵论滇人旧学，亦颇谓然。时周钟岳（惺甫）、由云龙（夔举）、赵式铭（星海）、方树梅（臞仙）诸老辈纂修《云南通志》，鼓励瑜专心本省文献，意有所动。既至丽江，习纳西文字成。次年复过昆明，携《云南备征志》、《滇系》诸书，六月至北平。数日，刘半农先生病歿，将整理纳西文字，无从请益。经友人董作宾（彦堂）介绍至南京从赵元任、李方桂两先生治语言学，编写《纳西象形文字谱》。居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内藏书甚富，得纵览之。南京国学图书馆多善本书，时往假读，约一年间，辑录云南地方史资料。是时，有中、英会勘滇缅未定界之议，痛感清季外交，丧权辱国，多作文议论，发表于报刊。所撰《纳西象形文字谱》成初稿后，携往苏州谒章炳麟（太炎）先生求教。复谒李根源（印泉）先生，以云南史请业，颇蒙教诲，谓瑜所论界务多空洞，当亲履边境，研究地方史事亦甚有益，乃以参与界务交涉。一九三五年九月赴滇西边区考察，周历傣族、拉祜族、佤族地区，于一九三六年夏归至昆明，因袁树五先生强留，教读于云南大学，至今已四十又四年矣。其初，授课之余，致力研讨云南史地之学。自一九三八年以后，连年兼任云南通志馆编审、审定、续修之职。分纂建置沿革、金石文字、宗教、族姓诸目，其余多参加讨论。又协助李印泉先生编辑《永昌府文征》，多作题跋。自一九三七年抗日军兴，内地大学及研究所有播迁至西南，加强抗战大后方，各地学人多来集昆明，尚论边政，瑜与凌纯声、向达、楚图南、闻宥诸友好主办《西南边疆》杂志，出版至十八期而辍。云南大学成立西南文

化研究室，瑜主其事，筹资编印丛书，先后成十一种。一时各地以研究边疆问题相号召，多有专著。瑜研究云南史事已有集稿，拟作专书；然分目既多，颇感芜杂，成稿者尚少。

我国自远古以来在辽阔地域逐渐形成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而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边地长期处于落后阶段。历代王朝设置政区，适应社会基础。秦汉以来有内郡、边郡之分，隋唐以来有内州、边州之别；此乃政权形式不同，国家主权则无二致。由于统治者之偏见，歧视边地，认为羁縻，实行大民族主义压迫，更使发展延缓。史家倡“异内外”之说，发挥“尊王攘夷”、“夷夏大防”等反动观点，为统治者服务，史籍记录缺略不实，且多诬蔑之辞，如班固《汉书·叙传》说：“西南外夷，种别域殊。”用“外”、“别”、“殊”之贬辞，历来史籍如此。故长期以来，边地历史遭到歪曲诬蔑，真相被隐晦，考究史事之作亦甚少。至近世始稍改变，则因帝国主义侵略，俄、日在北方，英、法在南方，窥我边陲，危及堂奥，有识之士，留心边事，乃有西北地理及满蒙史地之学，蔚为风气，多有著作，打破已往沉寂。而西南，则英帝自印度侵占缅甸，法帝囊括印支三国，侵入我云南。当中英、中法交涉界务时，有“既失藩篱于前，又蹙边境于后”之叹。时人多有慨愤文章，登诸报刊，至于研究史事之专著则甚鲜，比之西北、东北、北方逊色多矣。抗日战争期间虽有述作，成就亦少。

新中国成立之后，宣告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重视边省建设，为旷古所未有，社会历史调查研究，亦大改观。一九五四年，周恩来总理至昆明，视察云南大学，指示历史系教学、科研应重视地方特点，出人材、出成果。乃于是年秋开设《云南民族史》科目，由瑜主讲，编印讲义成两厚册，虽为由无到有

之创举，学术水平则甚低下。次年，设云南民族史专门组课程，相继成立研究室、研究所，与诸同道勉力从事，课题渐多，亦渐充实，昔日冷门寂静之学科，二十五年来已渐有繁荣景象矣。

瑜留心云南地方史，先后异趣而实相承，其初治文献之学，纂录故实，比勘考辨，囿于地方志书体例者十余年。后乃解脱，稍习科学，略知奥秘：盖从累积现象进而探寻实质，惟限于理论水平低，知识亦疏陋。数十年间积稿虽多，发挥新意而大都未惬于怀，且近岁已体力不及，盖瑜五岁时因扑地，右眼受外伤，从此，两眼红肿，视力模糊，深受其苦。二十岁至北京获治，恢复正常，至六十岁老眼衰退，有加无已，七十岁已甚严重。出外求医无效，中西医皆言将继续恶化以致失明，但尚有三五年可用。念此生勉力治学，已有积稿而未经编定，将至一无所成。乃自一九七三年春清理、改造旧稿，稍有可取者编录定稿，得友人誊写清本。五六年间竭尽心力目力，完成数种，共四百余万言。其数量较多者有《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及《滇史论丛》。前二书已有条贯，分题考之、说之，而《滇史论丛》尚未竟业。《论丛》率为散篇旧作，有专篇、专条及专书之部分可取者，其中多已发表于期刊，或刻印散发，亦有未刊手稿，已誊写约百万字，将分辑编定。今看书写字极感困难，期得他人帮助整理，继续编入。

云南地方史为中国史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但自来被歧视、忽视，至今凌乱亦甚。搜集整理，分析批判历史资料，揭示历史真相，仍然是今天史学工作者的迫切任务。云南地方史之研究亦应大有作为。瑜虽目力困难，丧失独立工作能力，但意志不能稍衰，故与研究室二三同道共商，拟定八年（公元一

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规划,力图将此科目提高到新水平。顾此科目,原是底子薄,且以往限于个体小生产方式,较之其他科学处在更落后阶段,须急起直追,则惟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始克有济。所拟四项课题为此科目基本建设打下坚实根底,使有志于此者得到充分利用,贯彻实事求是原则,长期共同奋斗,发扬而广大之,非仅一人一时之事也。瑜年迈力衰,惟在大好形势鼓舞下,尚无迟暮之感,当与诸同道者黽勉从事。犹盼完成八年规划之后,尚得余年,为社会主义事业竭尽绵薄之力,勿负此生矣。

公元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八日

丽江方国瑜谨识,时年七十有八

方国瑜先生传略

林超民

方国瑜先生，字瑞臣，云南省丽江县人，纳西族，清光绪二十九（公元一九〇三年）正月十八日诞生。因不通汉语，九岁始发蒙读书。自谓“资质粗笨”，故勤奋补拙。读《论语》“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之句，不甘居下，自署书屋为“困而好学斋”以自勉，促居书屋，终日伏案，所读四书五经诸子之文，至老犹能背诵如流。

一九二二年夏，先生毕业于旧制中学，乃离乡远游，一九二三年四月到达北京。一九二四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以学习勤奋、品学优良见重于师友。先生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向导》周刊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相号召，积极投入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与同班好友湖南谢伯屿（中共北京市委委员）被推举为校学生会干事。后被选为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干事和全国学生总会干事，参加了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在天安门示威游行的组织工作。北京市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就在这一天发行创刊号，而这个刊物的主办人是云南剑川人张伯简。早在丽江念中学时，先生就读过张伯简从法国寄来的共产主义宣传品，对张十分仰慕，得知张伯简在京主办革命刊物，便主动与他取得联系；又通过张伯简认识了《向导》周刊的发行人李树青。在担

任全国学生总会干事期间，先生与谢伯屿、吴平地（中共党员）等共同组织北京师范大学预科学生去天安门参加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要求赶走黎元洪、曹锟，迎接孙中山先生来京组建“临时政府”。当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时，先生被举为学生代表，进入火车站月台迎接孙中山先生入京。

一九二五年，先生参加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四”运动纪念大会。游行示威时，先生奋勇当先，与警察英勇搏斗，右臂被打伤。先生不因此畏惧退缩，斗志愈高，为揭露上海“五卅”惨案的暴行，在伤体尚未恢复的情况下，毅然率领一个学生小分队到天津、济南、南京、扬州等地宣传。返京后，先生即加入云南左派学生组织“新滇社”，并主办《云南》周刊，积极鼓动革命。

一九二六年夏，先生患大病住院，不久休学回家。一九二七年龙云等四镇守使发动云南“二·六”政变，战乱蜂起，土匪横行，先生困在丽江，埋头读书。一九二九年秋，北上复学。因挚友谢伯屿、吴平地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与李达先生同时被捕，又同时慷慨就义，先生无法与党取得联系。因大革命失败，学生组织涣散，学生运动沉寂，而“整理国故”之风方兴未艾，先生乃立志于国学研究，为中华民族争光。复学时便要求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本科，系主任钱玄同以先生在预科读书时已有几种著述，准许跳级，直接在本科二年级注册。

一九三〇年春，在钱玄同的鼓励下，先生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同时在两个学校研读，先后从钱玄同、余嘉锡、马衡、刘复诸先生攻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又得高步瀛、吴承仁、黎锦熙诸先生的指导。

与此同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陈垣（援庵）见先生所写《中国道教史》颇有见地，知先生是边疆少数民族学生，殊为器重，指导他选修大量史学课程，并从杨树达、梁启超诸学者治史地之学。先生回忆说：“我在北京求学期间，多闻议论，开阔眼界，稍知读书门径，想以学术上成就最高的几位先生为榜样来深造，曾刻意读《章氏丛书》，觉文笔深奥，论说抽象；又读《饮冰室文集》，觉感情奔放，议论酣畅；读王国维、陈援庵先生的论著，感到朴质存实，方法严谨。读王先生书，将创新意，作文议论；读陈先生书，有所补苴，多作札记。因此王、陈两先生对我影响较大。还有冯承钧翻译法国汉学家的著作数十种，也有人翻译日本学者所作西域南海论著，我都细读，增益新知。”这段时期，先生纵观四库典籍，广及海外译著，钩稽故实，发微阐幽，多有论著发表于报刊，为学术界重视。先生生前清理三十岁以前存稿，认为可取而亲自编定者，有《广韵声汇》（共三十八卷，分装两函十二册）；《困学斋杂著五种》，包括《广韵声读表》、《隋唐声韵考》、《慎子考》、《慎子疏证》、《论学存稿》。尚有《说文声汇》、《释名声汇》、《石鼓文研究》、《论语朱注匡谬》等底稿若干册。

一九三二年，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本科，第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编辑员、洛阳师范学校教师、北平私立民国大学国文系教授。当时，刘半农任北京大学研究所所长，建议先生回乡整理研究纳西象形文字。一九三三年秋，先生回到故乡，深入到金沙江边的石鼓、巨甸等地考察，首次发现纳西标音东巴文摩崖，向东巴经师学习，调查记录了大量东巴文资料。一九三四年六月满载纳西象形文字资料回到北京。不久，刘半农先

生病歿。经董作宾介绍，到南京向赵元任、李方桂两先生学习语言学，用国际音标给纳西语标音，编成我国也是世界第一部科学的《纳西象形文字谱》。

先生回乡搞纳西象形文字时，在昆明与袁嘉谷先生会晤，纵谈滇人旧学，深得袁的赞许。当时周钟岳、由云龙、赵式铭、方树梅等正筹办纂修《云南通志》，希望先生能参与其事，先生遂有心于云南史地之学。回北京时，携带《云南备征志》、《滇系》诸书，潜心研读。一九三四年秋，先生在南京寄住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内藏书十分丰富，南京图书馆又多有善本，得尽情纵览。约一年时间，辑录云南地方史料盈篋。先生后来成为云南史学界巨擘，其根基于此奠定。

时值中英会勘滇缅边界，英、法帝国主义觊觎我云南边疆，蚕食鲸吞，凶相毕露。先生痛感清季外交丧权辱国，满怀爱国义愤，撰写文章，考证中国西南边疆沿革，以历史事实痛斥英、法侵略者无耻谰言。由此，倍感史地之学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击侵略中的重大作用，立定志向，专攻西南史地之学。先生所撰《纳西象形文字谱》成初稿后，携往苏州拜谒章太炎先生求教。同时拜谒李根源先生，以云南史地请教。李根源先生肯定其成绩，并指出所论史务多空洞，建议深入边界，实地考察。经李根源推荐，先生回云南参加界务交涉。一九三七年九月到滇西边地考察，亲履傣族、拉祜族、佤族地区，写成《滇西边区考察记》等专著。此书迄今乃为学术界推崇，为民族学、边疆史地之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一九三六年夏，经袁嘉谷先生一再邀约挽留，先生在云南大学执教，先后任文史系教授、文史系主任、文法学院院长。一九三八年后，又连年兼任云南通志馆编审、审定、续修之

职，撰写了《建置沿革》、《疆域考》、《金石考》、《宗教考》、《族姓考》诸目；并参加了全书的编纂和审定工作，为《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编《新纂云南通志》时，曾拟议由先生任总纂，并到重庆审定全书。为此，当局举先生为伪立法委员，既有名望又有高薪。当时通货膨胀，文人收入低薄，先生家计殊为困难。但是，目睹反动政府贪污腐败、营私舞弊，先生以要做清白正直的学人，不为肮脏奸滑的政客为宗旨，严辞拒绝。不久，当局又以“社会贤达”名义推先生为国大代表，以高官相邀，以重利引诱，尽管先生生活非常拮据，仍不改初衷，多次通电省选举委员会和丽江选区，坚决推辞，而专心教学和著述。

抗日战争期间，先生邀约凌纯声、向达、楚图南、闻宥等学者编辑出版《西南边疆》杂志，指点江山，纵论边政，研究边疆史地，探讨民族风俗。后云南大学创建西南文化研究室，先生任主任。他克服资金不足、纸张缺乏、印刷不便等困难，先后主持出版丛书十一种，为活跃后方学术气氛，提高边疆学术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九四六年，保山旅省同乡会聘约几位学人纂修县志，推先生任总纂。在此之先，先生曾协助李根源先生编纂《永昌府文征》，多作题跋。先生到保山趁便收集滇西抗日战争资料，周历惠通桥、松山、龙陵、芒市、遮放、黑山门、畹町、腾冲诸战场，广收战报文书，走访亲历其事者，写成《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六卷，为国内关于滇西抗日战争最翔实最珍贵的资料之一。其中一部分收入《保山县志》。先生主持的《保山县志》编成三十余册，已誊写清本交保山县志馆，今存保山市文化馆。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在政治和学术上都获新生，从潜心据的学术生活中解脱出来，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高昂饱满的政治热情，勤恳踏实的学术态度，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献身于党的教育事业和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之余，先生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一九五四年参加云南民族识别的领导工作。一九五六年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全国性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担任云南民族调查组副组长；参加创办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并任副所长。先生夜以继日，查阅大量文献，编写了《云南民族纪录》等重要参考资料，并亲自在楚雄、大理、西双版纳、德宏、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指导工作，为云南省的民族调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五四年，周恩来总理来昆明，视察云南大学时指示：历史系应结合地方特点，加强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先生立即响应，同年秋季就在历史系开设了云南民族史课程，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编写了六十余万字的《云南民族史讲义》。第二年又开设云南史籍评论课程，写成《云南史料目录解题》一书作为教材；接着又开设彝族史、白族史等课程。这些都是从无到有的创举，为云南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开拓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在先生的努力下，一九五九年秋，历史系创办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并亲自与其他教师合作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史讲义》上中下三册约八十万字。一九六三年又创办云南民族史研究室，一九七九年发展为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从五十年代起，先生先后招收三届中国民族史研究生。从一九七八年起，又先后培养三届硕士研究生、一名博士研究生，并接受一名外国留学生、一名外国进修学者。昔日冷门寂寥的学科，已

渐呈繁荣景象。云南大学历史系以民族史的教学和科研显出特色，受到国内外的重视。今天国内不少有成就的西南民族史、民族学的中青年专家，就是先生亲自培养的学生。

“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中国大地，锋芒所向，直指学有成就的专家教授。先生亦不能幸免，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非人的侮辱、折磨和迫害，住房被强占，书柜被查封，不少书籍文稿被掠劫而去。先生坚信，这决不是共产党的政策，抱定“别人想怎么说由他，自己应如何做在我”的宗旨，白天挨批斗，晚上局促于狭窄拥挤的房间里俯首案头，奋笔疾书，改造旧作，撰写新篇。一九六九年十月，先生被赶到弥勒县农村“改造”。第二年春，周恩来总理指示要编好《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生是该书西南组的负责人，被召回去参与工作。尽管当时仍是“控制使用”、“监督改造”，但先生置之不顾，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克服各种难以想像的困难，于一九七二年底与尤中、朱惠荣等同志一起完成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部分的编绘工作。一九七三年初，又着手整理《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全书八十余万字，到次年八月才完稿。因过度劳累，九月初，他胃溃疡病大发作，吐血过多，一时不省人事，经医生抢救，切除胃脏五分之三，疗养调理四个月后方康复。还躺在病床上，先生便考虑《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的整理和撰写。出院后，立即动手工作。多年眼疾，因工作繁忙日趋严重，视力减退，有加无已，到一九七五年，看书除戴深度“盲人眼镜”外，还须加一高倍放大镜。写字因数十年锻炼，“指头有眼”，虽写时已看不清，仍勉强成字。先生就这样坚持俯案著述，无日或已，经两年努力，终于完成百万余字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